

论汉代朝廷在思想文化传播控制中的作用

王 冉

(河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施行对思想文化的“软控制”。朝廷作为传播控制的主导者,从源头把关,并通过确立察举制度等手段引导人们尊儒崇儒。同时,还通过提倡孝道以进一步实现对思想文化的传播控制。

[关键词]思想文化;传播控制;传播;儒学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09)01-0080-02

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秦朝廷通过“焚书坑儒”的方法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控制,成为最终导致秦亡的原因之一。汉代吸取了秦的教训,对思想文化的传播控制主要以“软控制”为主。以皇帝为首的汉朝廷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

一、把关

把关人理论,是传播学奠基人K·勒温1947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传者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有重大的过滤作用,他总是根据自己的倾向、一定的标准、特定的情景对要传播的内容进行筛选,以取得自己所期望的效果。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就成为了汉代思想文化传播的总把关人。

首先,通过修史来排斥与儒学不一致的思想观点。汉武帝时,司马迁写史记,坚持真理,敢于揭露帝王的罪恶和隐私。因此,遭到汉武帝的不满。卫宏《汉书旧仪注》中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此外,最高统治者还亲自执笔撰写史书。如明帝著有《光武本纪》,章帝撰有《显宗本纪》,使经学思想和官方意志直接得以渗透。同时,由皇帝钦令编撰丛书、类书,以统一思想、禁锢人心。汉武帝之后,儒学处于独尊地位,但其内部的分化和斗争也进一步发展。为了统一儒学,东汉建初四年,在汉章帝的主持下召开了著名的白虎观会议,后命班固将讨论成果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成为官方儒学的典型代表。

其次,通过文字狱来排斥异端邪说。文字狱是指统治者从奏议文书乃至诗词、书信中寻找某些词句任意歪曲,制造冤狱,杀头或流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汉代的“杨恽案”。杨恽,出身名门望族,是司马迁的外孙,“以才能称”^[1],因在《报孙会宗书》中说到“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1]惹怒汉宣帝而被勒令用刑。《后汉书》中张晏为这句话作的注向我们解释了原因——“山高在阳,人君之象也;污秽不治,朝廷荒乱也;言豆者真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

汉代对思想文化传播控制的最明显的表现还有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东汉后期,由于“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2]。士人为了激浊扬清指正弊端而品评清议。尽管他们的传播行为有利于政治的改进。但已经腐败的朝廷认为他们是“诽讪朝廷,疑乱风俗”^[2],对这些士人大加逮捕和杀戮,酿成两次“党锢之祸”。其对士人的钳制不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二、引导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包含了三个文教政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明师”、“重选举,广取士”,

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责成宰相公孙弘拟定了较为具体的方案,由此建构出一个教育—选士—尊儒的利用学校教育来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有效模式。

1. 设经学博士,建立太学。

博士,古代学官名,始于战国。汉文帝时,始置《书》、《诗》的一经博士。景帝时,又置《春秋》博士。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罢传记博士,又为《易》和《礼》增置博士,与文、景时所立的《书》、《诗》、《春秋》合为五经博士。从此,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儒家学说的政治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公元前124年,经公孙弘等人设计,太学正式建立,成为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的重要基地。朝廷对太学的管理,除委任掌管文教的官员总负责之外,皇帝还亲自到太学视学,足见对太学教育的重视。在汉朝廷的推动下,汉末,太学生成了政坛上的一股重要力量。

统治者建立太学,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汉代太学实行了养士与选才相结合的办法,同时也改革了文官的补官与晋级规定。自此以后,文学礼义,通一艺以上者都被列为补官、晋级的条件。《史记》上记载,武帝时,“能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由于官吏的文化程度,儒学的修养水平受到高度的重视,因此造成汉代“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3]的局面。

2. 确立察举征辟制度

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在西汉文帝到武帝时期形成。那种由各级官员荐举贤良,送到朝廷,皇帝亲自策问,要求针对时政提出建议,周之密之作答,答案要封好交皇帝亲自拆阅,评定高下,酌授官职的办法,是察举制度的正式开端。到武帝光元年,汉武帝对汉代统治策略上的重大转变已经酝酿成熟,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大局已定,以儒术取士的察举制度也就应运而生。

汉代察举制度的实质或核心即以儒术取士。汉代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茂材、贤良方正等等。孝廉科就是察举孝子廉吏,汉惠帝吕后都曾诏举“孝悌力田”之举。根据儒家的思想,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方,因此,察举孝廉被确定为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科目。后来,由于察举的科目繁多,汉武帝时,把标准统一为所谓的“四科取士”。

汉代还借鉴秦代征召之法,实行征辟。征辟是高级长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是汉代除察举之外最重要的一种选官制度。由皇帝或官府直接聘请某些有名望的士人,授予官职。被皇帝征召的,除了个别专门的技能之士,多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经学大师。汉代曾经被征的著名

治经儒者还有韦贤、疏广等,当时曾被官府辟除的士人,也大都还是经学之士,如匡衡、郑众等。

儒学一旦与仕途结合,就对士人、官吏的思想起着控制和导向的作用,士人要做官,就必须通儒学,使自己的言论与官方的正统思想保持严格的一致。在朝廷教育政策的引导下,学经一通经一人仕就成为时人追逐名利福祿的最佳途径。由此,朝廷对思想文化的传播控制进一步实现。

三、隐性控制

除了以上较为明显的手段,还有一种“隐性控制”同样不可忽视。那就是汉朝廷通过“劝孝”的方式来加强儒学在构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影响。汉代统治者在先秦的一些道德理论中,找出“家国同构”理论,强调家国一体。所谓“家国同构”,就是把君、父的角色合二为一,使皇帝(后)既具有至高而上的政治权威,同时又可以成为天下所有人都必须尽孝的父母。关键乃在于:向皇帝尽忠也就等于最大的孝亲。所以,汉代统治者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公开倡导全国以“孝”为本。这使得原本只属于宗法伦理的孝道走进了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泛道德观念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进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汉代孝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汉代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加强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

(上接第65页)

(三)幸福感教育对于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幸福感教育的目的就要人人都感到幸福或者通过一定的方法获得幸福,不论你是否有钱,无论你地位高低;每个人在关注自身的需求及爱好的同时找到自己生命的使命感;每个人在不同的层次为社会服务,也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内获得自身的幸福。可以看出,幸福实现的目标与我国构建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这项教育的实施对我国实现和谐社会及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在我国大学生中开展幸福感教育的路径探索

幸福感教育就是让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去认识自我、认识社会,在不断地探索和探寻中取得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平衡。其从人的本性出发,重视人的个性发挥的理念与我国大力提倡的大学生素质教育 and 创新教育非常切合;与看似相对立的大学生艰苦奋斗教育也不矛盾,它是让同学们去积极地奋斗,而把艰苦的过程转化为幸福的感受。幸福感教育不是虚无的空中楼阁,它是有路径可寻的:

(一)在高校开设积极心理学的课程

目前积极心理学在美国已向普及的方面发展,现共有200余所高校开设了“积极心理学”课程。在我国只有清华、北大等个别大学开设过积极心理学的讲座,据悉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应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每一所大学都应开设积极心理学的课程,同学们早一天得知幸福

控制传播一直是有效控制社会的一种方法。集权的传播控制可以制造传播的神话,即只允许掌权的少数人达到自己的目的,运用一切可能运用的传播工具传播自己的“主流意见”。汉代统治者就是如此。在朝廷的掌控下,儒学得以繁盛并成为汉代社会的“主流意见”。汉代思想文化的传播控制在当时看来是较为成功的。儒学渗透在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汉时期的传播控制手段及其后果,对古代传播事业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注释]

- [1]《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 [2]《后汉书·党锢列传》
- [3]《汉书·儒林传》

[参考文献]

- [1]张国良.传播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12
- [2]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4]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九辑[M].三秦出版社,2004.
- [5]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

[责任编辑:王云江]

的方法就可以多幸福一天,多一个同学明白了幸福的含义就可能减少一个抑郁者。

(二)增强大学生幸福的能力,提升其幸福的感觉

帮助学生树立自我和谐的目标,提升其攀登的幸福感。“自我和谐的目标,乃是发源于内心最坚定的意识,或是最感兴趣的事情。……追求这些目标,不是因为他人觉得你应该这么做,或是因为责任感,而是因为它对我们有深层的意义,并且带给我们快乐。”^[1](P75)]也就是引导学生确立自身愿意从事的、对社会有价值的目标。在大的目标之外(二三十年或更远),还可以确立一些小的目标,这样每实现一个小的目标,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离目标靠近的喜悦,这种攀登的幸福会使学生们感受到过程的幸福,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帮助学生战胜消极,体会“做自己”的幸福感。泰勒说:“我发现原来幸福就在于能掌握的积极心理力量;原来人有无限的潜能,却自己不知;原来每天可以体验幸福,却常常规而不见;原来心理的力量可以‘练习’,而很多人却习惯于无助……”其实,幸福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应教育学生除了成功能获取幸福之外,身边还有很多获取幸福的途径,悦纳自己、善待他人、简化生活、学会失败都能使我们更加幸福!倾听内心的声音,勇敢地做自己就会更幸福!

[参考文献]

- [1]泰勒·本一沙哈尔.幸福的方法[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陶爱新]

On improving happiness education for undergraduates

ZHANG Li¹, QIU Ai-hui²

(1. Party Committee Office, Shijiazhuang Railway Institute,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2. School Offic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16, China)

Abstract: Positive psychology argues that happiness is the “combination of enjoyment and sence”. Happiness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concept meets the demand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can improve the way of innovating ideology and the building of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path of happiness education.

Key words: positive psychology; undergraduate; happiness education